

北语学人书系

第一辑

黄卓越

思想史与批评学论文集

黄卓越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北语学人书系

第一辑



黄卓越

思想史与批评学论文集

黄卓越 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黄卓越思想史与批评学论文集 / 黄卓越著. —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8

(北语学人书系. 第1辑)

ISBN 978-7-5619-3356-5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思想史—文集②中国文学—文学批评—文集 IV. ①I209-53②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6824号

书 名: 黄卓越思想史与批评学论文集

责任印制: 汪学发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15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www.blcup.com

电 话: 发行部 82303650/3591/3648

编辑部 82300116

读者服务部 82303653/3908

网上订购电话 82303668

客户服务信箱 service@blcup.com

印 刷: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7.25

字 数: 278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19-3356-5 / H·12114

定 价: 43.00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82303590

出版说明

北京语言大学是一所颇具特色的学校。在这里，聚集了数百名语言教学和研究人员，语言学研究队伍极为庞大。近年来，随着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建立，中、外语言文学已然成为北京语言大学的两大支柱学科。依托这两大学科，一批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脱颖而出，其中有的已成为本专业领域的领军人物。在汉语国际教育、汉语研究、外语研究、语言信息处理、中国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等领域，北语学人已成为一支不可或缺和不可忽视的力量。

倏忽之间，北语建校已经五十周年。五十年来，代有才人。然而，学校一直未能对北语学人积累下来的珍贵的学术财富进行系统的梳理。为弥补此缺憾，值此建校五十周年的特殊时刻，学校决定设立“北语学人书系”，收录北语优秀学人的优秀论文，每人自成一册，不定期陆续出版。因为时间仓促，本辑只约请了已退休的博士生导师和现任博士专业学科带头人，以便能赶在校庆期间见书，初步展示北语学人的学术风貌。今后，我们仍将继续组织征集优秀书稿，以“北语学人书系”的名义分辑出版，以体现北语学术的全面性和延续性。

为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批高质量书稿的征集和编辑工作，校科研处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各位作者积极甄选论文、认真校对，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领导高度重视，编辑们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最终使第一辑书系得以如期出版。这正是北语精神的具体体现，亦当记录并彰扬。

北京语言大学

2012年6月

目 录

001 / 批评史、文论史及其他
018 / 书写、体式与社会指令
032 / “大众”叙述的历史岔路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大众文学观
049 / 从文论史到心灵史：一种民族性建构的途径
057 / “淮南格物论”的构设及对《大学》的重释
121 / 赵贞吉的经世 / 出世论：学渊与间架 ——兼论一种思想史的线索
147 / 张居正与王学关系之考辨
165 / 茶山四书经学的返古主义路径 ——兼论其与朱王之学的关系
184 / 时文与古文的交涉：晚明时文批评的向路
205 / 摆渡于破立之间：重显颂古的文本策略
219 / 后儒学之途：转向与谱系
236 / 儒家整体主义话语的后现代反思
253 / 扩域与限界：儒学的意识形态之维
269 / 后记

批评史、文论史及其他

如所周知，在目前的中国文论史（文艺理论史）表述中，像“古代文论”、“古代文艺理论”一类的概念似已成为一种统摄性话语，用以概说整个学科的历史状貌。然而，如果反观 20 世纪前半段的该学科研究，学界用之更为频繁的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概念，最显著的例证如该领域的拓荒之作陈钟凡先生的通史，及被称为批评史研究三大家的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的奠基之作，皆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冠其名。四家之外，有所造诣者如方孝岳、傅庚生的著述也按通例以“中国文学批评”命名。由此可以断言，“批评史”的概念是那一时代学者所通用的学科用语。

而将对这种现象的认定推而广之，那么就自然会形成一种新的描述，即在整个 20 世纪的“文论史”研究中，事实上至少出现过两种不同的主导性的学科命名方式。按照雷蒙·威廉斯的说法，词语的变迁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会映现出社会与历史的塑形过程。作为学科命名的概念更当如此，选择或换用怎样的概念来定义学科，会在其下隐藏着对整个学科定位、属性及方法论模式的一般性认

识。^①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当代的叙述中,这两种概念的区分与差异则往往是被忽略或掩遮的。“古代文论”(“古代文艺理论”)的概念多被作为一种总体性言说用以概述学科发生以来的全部事件(即将全部现象归纳到“理论史”谱系的描述中),而不曾考虑已然出现过的“批评史”概念当有的意义及由此形成的其与“文论史”概念的某种间距。此种叙述的惯力,一方面使得长时期以来曾经通用的“批评史”概念无法着落在其原来的地面上,甚至于在当代的表述系统中变成了一未有实义的剩语;在另一方面,这一曾有的概念又会固守在原有的历史位置上,“提请”人们对之的注意,它不仅是难以遽然抹去的,而且也会从更深的角落中不断地祭起它的“亡灵”,形成对总体化概说的某种质疑。如果我们同时注意到这两种情况,那么也就自然会发现存在于学科叙述中的某种话语断裂。

有基于此,本文试图返至一更长的历史序列之中,将批评史、文论史二概念的区分作为重新理解学科史范式构建与转换的重要话题。在比较确切地描绘出二概念迁移的轨迹之时,进而追寻如下的若干问题,如:批评史与文论史的概念各自是根据什么理由被提出,以致会形成二者间的区分?文论史的概念又是怎样及在何种驱力下逐渐替代批评史的概念的?鉴于文论史的概念可能面遇的一些挑战,那么更进一步的设问同样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即在当代新的学术语境中,是否已经出现了一些替代性的构想?或者也可换成更为直接的提问,在经历了“理论之后”的观念性冲刷之后,学科史重组的冲动有可能朝怎样的方向移动?如是而论,借助于此种对学科命名方式的考察,也将导致对整个20世纪文论学科范型变动的一种重释。

一、批评史的定位及意义

如上所述,在20世纪前半期,以“批评史”来命名学科已成为一种通识。虽然其他的称名方式尚有其例,但以“文学批评”作为组织历史表述的核心词语

① 参雷蒙·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导言,页15。

仍是当时的一种主潮，即便当时也有学者曾对该用语提出过异议，但最终还是选择以之来命说自己的研究（如罗根泽），可见“批评”一语的使用有其难以避免的历史缘由。与之同时，被选择的观念也会以其所携带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规范学科叙述的作用，及成为构建这一新兴学科的某种语法规则。

目前，学界一般均将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看做20世纪文学史研究的起端。在该书的前几章中，陈氏对“批评”一词的来源作了解释，如谓：“诗文之有评论，自刘勰、钟嵘以来，为书众矣，顾或究文体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则以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考远西学者言‘批评’之涵义有五：指正，一也；赞美，二也；判断，三也；比较及分类，四也；鉴赏，五也。……”^①意谓批评作为一种活动实为中国早已有之，但对“批评”的认识则一直并未达学理化的层次，因此需要以西方已经成熟的批评概念来观照之、明晰之，使之进入系统化的认知。^②这大致也可看做是学界使用西方“批评”概念来梳理中国相应对象的最初设想。陈钟凡的这一论述对后来的影响很大，举例而言，如朱自清在为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撰写评论时所持的意见便大致类此：“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中国只有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现在虽也认为是重要的批评典籍，可是他当时的用意还是在论述各体的源流利病与属文的方法，批评不过附及罢了。这两部书以外，所有的都是些零星的、片段的材料。……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不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的系统来。……‘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③与陈钟凡的想法一

①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初版，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重印版，页5。

② 如其又云：“文学评论，远西希腊学者亚里斯多德以来，迄于今日，已成独立之学科矣；中国历代虽无此类专门学者，然古人对于文艺，未尝不各标所见，加以量裁……”（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页8。）

③ 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页539~541。

样,朱自清也从中西比照的视角来阐述新学科确立的必要,即以为中国的史料尚存在着零散化等的不足,诗文评之地位较低,批评之概念不清,故而需要借助西方已经成形的批评观,整理、构建出一个系统而独立的学科类型。其他几位学者在此基本问题上的意见也大体近之,恕不作赘述。

从上节表述也可得知,在前辈批评史家处,取用“文学批评”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不单单是挪用一称谓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借此以获一种可为独立而成熟之“学问”(朱自清)或“学科”(陈钟凡)的方法。当然在这些表述中,诸人有时并不十分清楚如何将作为实践的“批评”与作为学科研究活动的“批评史”撰写区分开来,以致会显露出概念上的些许混乱。但如涉及后者,用“批评”的概念来界定一门学科,至少仍会存在着两方面的考虑,即:包含有对研究对象与范围的重估(以下仍会述及),及于学科方法上的镜鉴。在前辈史家的心目中,尽管中西批评在实践上是有异出的(一般都承认),但在学科治理模式上,却存在着方法论上的可贯通性。这固然与前代学者受及的普遍主义与科学主义理念影响有甚大的关系,为此也决定了他们会以西方现成的“文学批评”概念(而非“诗文评”等)来命说一门新学科的属性。

至于,为什么取用“批评”,而不是“文论(文学理论)”或其他的概念作为学科称名的表述?不容置疑,首先会与西方当时的学科现况直接相关。从前期各家援引的西方言说看,又几乎都来自于英美。而我们知道,20世纪上半叶于英美最为通行的是诸如实践批评(practical criticism)、道德批评(moralistic criticism)、心理批评(psychological criticism)、细读法(close reading)及稍后流行的新批评(new criticism)等,以“理论”为学说、为学术标目的风气在当时的文学研究界尚未出现。^①而批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即在于它往往与对文学作

① 刘若愚在20世纪70年代撰写《中国文学理论》一书时述及美国的情况,如谓:“一般似乎都认为文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虽然有时候也分成三部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后者的分法中,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指实际批评,这种分类至今仍未获得普遍采纳,而许多作者仍然使用‘文学批评’一词以包括理论探讨与实际批评这两者。”(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页1。)这个分类意识有同于罗根泽处,另也可推知理论在此期于美国学术界已处上升状态。

品的评判（“裁判”）有密切之联系，此也深嵌于上述几种西方批评类型的具体展开中，重视于文本（文学史的）分析与实验性的经验，而不似理论研究更偏向于搭建抽象论辩的框架或从中引出意见，与具体的文学活动一般都维持较远的距离。与之相应，对批评与文学间关系的重视也都会表现在民国间诸批评史家的论说中。如民国时期出版的几种批评史著作都会在绪论中首先界定文学的义界，进而阐述批评与文学的关系，以示批评对文学活动的依赖与依附，对二者关系的突出强调是被作为批评、批评史能够展开的基本逻辑前提来论证的。对诸家的言说，可试举数例证之。如陈钟凡认为：“若夫批评文学，则考验文学著述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之学术也。”^①方孝岳谓：“至于我们现在把一个国家古今来的文学批评，拿来作整个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使人借这些批评而认识一国文学的真面。批评和文学本身是一贯的。”^②郭绍虞先生在忆述其撰写批评史的契机时谈到其最初是欲尝试写一部文学史的，后才不得已缩小范围，然却是“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的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最有密切的关系的”。^③据此我们也能理解了，为什么郭先生的批评史著述是以“文学观念”的演变为主轴的。罗根泽先生对批评史的研究历程，据其自述，也是先攻历代文学，然后辑“文学批评论集”与作“文学批评史”^④，这一先后顺序也反映出了其对二者间关系就近性的某种思量。

当然，诸家对“批评”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一点，是围绕着对传统“诗文评”的体例进行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诗文评”的范围有一概述，并辑录如《文心雕龙》、《诗品》等专著与诗话、文话为主要篇目。从上引陈钟凡之语看，他则以为刘勰、钟嵘等的专著“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因而才以远西学者所论批评的五种涵义来规正之，其实是想以范围更广一些的具体的批评等来扩充旧的概念。朱自清也以为虽然现在有人将钟嵘、刘

①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页5。

②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1934年初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重印版，页17。

③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新版，自序，页1。

④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重印版，自序，页1。

劉的著述视若批评典籍，但“批评不过附及罢了”，这表明其对“批评”的界义也另有所求，而不赞同将理论性、条说性更强的“著述”视为判说的圭臬。^①又如出版较早的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则借论总集而强调“具体的批评”之重要：“我国的文学批评学，可以说向来已经成了一个系统。我们看清《四库全书总目》，不是有‘诗文评’的专类么？但是我们如果对于‘诗文评’这一门学问，稍稍上溯他的流别，就可以知道除了评论诗文的专书而外，还有许多可以说的。自从《隋书·经籍志》立‘总集’一类，把挚虞《文章流别》、昭明《文选》、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这些书，都归纳在里头，我们于是知道凡是辑录诗文的总集，都应当归在批评学之内。选录诗文的人，都各人显出一种鉴别去取的眼光，这正是具体的批评之表现。”^②尽管他们未必就将更为专门的著述与理论性排除在学科之外，但却都企图在拓展界义的范围之后，将具体的批评纳入到“批评”学的核心范畴中。通过对“诗文评”所确定的界限的质疑，目的也在昭示出批评与文学活动之间实出天然的依存关系，并认定“批评”是一种可直接介入“文学”的智性化活动。^③

如果从强调的侧重点上看，罗根泽先生的论述或有所不同。其批评史绪论云：

近来的谈文学批评者，大半依据英人森次巴力（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The History of Criticism*）的说法，分为：主观的、客观的、归纳的、演绎的、科学的、判断的、历史的、考证的、比较的、道德的、印象的、赏鉴的、审美的十三种。依我看是不够的。按“文

① 正因如此，以批评史命名的前期几部著作如陈钟凡、郭绍虞、朱东润等批评史皆未给予刘勰《文心雕龙》以很多的篇幅，而不像后来的文论通史对之作长篇的铺陈。为此，也出现了有人曾撰文批评郭绍虞“没有一章专讲此书”，见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版，页1。

②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页19。

③ 另也可参考朱东润的论述，其先举《四库总目·诗文评类提要》厘定的五种类型，进而云：“举此五端以当文学批评，范围较狭，而诗话词话杂陈琐事者，尤非文学批评是正轨。然前代文人评论之作，每每散见，爬罗剔抉，始得其论点所在，正不可以诗文评之类尽之也。”（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44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版，页3。）

学批评”是英文 Literary Criticism 的译语。Criticism 的原来意思是裁判，后来冠以 Literary 为文学裁判，又由文学裁判引申到文学裁判的理论及文学理论。文学裁判的理论就是批评原理，或说是批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之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①

细绎罗根泽的论述，其绪论中实包含有与陈钟凡及其他先行者争辩的意识。^②所谓森次巴力对批评的十三种归类，陈钟凡著作中则称为十二种归类，但节目大体相同，应出于同一来源。郭绍虞批评史也曾述及这些分类。^③从罗根泽的叙述看，则以为仅限于这些分类是不够的，因为有可能遮蔽批评固有的分层，尤其是前人多偏向于以狭义的批评（文学裁判）来定名学科，以致忽视理论在批评系统中的意义。为此，他明确地指出“批评理论”与“文学理论”两层意义，并将对此的展开称为是广义的批评。其后，罗先生又激辩“批评”的概念在中译时的不确，认为若改用“评论”则一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中国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④），二是也与英文 Criticism 的原义相吻。如实而论，如果从批评与理论的关系看，陈钟凡的十二种分类确有含糊不清之处，但因陈氏曾将分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页5。

② 罗根泽1943年所撰自序曾言及其阅读经历：“陈钟凡、郭绍虞两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孝岳先生《中国文学批评》，日人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皆曾参阅；朱自清、朱东润、伍叔傥、汪辟疆……诸先生，皆曾商正。……”（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自序，页3。）

③ 郭著批评史章二论“南朝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以为该期批评家能应用多种批评方法，并列归纳的批评、推理的批评、判断的批评、历史的批评、比较的批评、道德的批评、审美的批评、考证的批评、赏鉴的批评等。与陈钟凡所列批评的分类相当，尤前四项恰为陈氏所特列者。朱自清为此也曾言郭著“各类品牌的名称偶尔涉及”，见《朱自清古代文学论文集》，页541。

④ 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页13。这个判断实有很大谬误，待后有时再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一文评罗根泽批评史中此段言论也颇有微词，并举例曹丕、曹植等的批评，“都并不侧重理论”；“罗先生称这些为‘鉴赏论’，鉴赏不就是创作的批评或裁判么？……”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页546。又通过广泛举例，以为：“……从以上所说，可见所谓的文学裁判，在中国虽然没有得着充分的发展，却也有着古久的渊源和广远的发布。这似乎是不容忽视的。”同上，页549。

类中的归纳、推理、判断三种专门标出,并作为“一切批评之基础”^①,因此也有与罗根泽的思想接近之处,即并未完全限于从裁判的角度定义批评。但罗氏以“狭义的批评”与“广义的批评”分疏“批评”的概念则无疑有其十分重大的意义,不仅第一次鲜明地揭示(同时也是制造出)了理论与批评两概念之间的紧张,而且也可借此理清批评概念中容易引发的一些混淆,深化对批评史学科的认识。

当然,虽然罗根泽对“批评”的译语并不满意,以为最好用“评论”一语替之,但并未将其史著改名为评论史或文论史,据其自述这是因为“批评史”的用语已经“约定俗成”。然而,如从其对批评概念的阐释来看(无论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也还是另有成因的。如其在进一步剖析文学裁判、批评理论、文学理论三个大单位的内部组成时(见其图示),仍是将所有的内部元素都看做带有“批评”之属性的:批评理论由批评的立场、批评的方法、批评的错误、批评的批评组成;文学理论则由“批评的建设”组成等。因而,至少在其看来,批评理论或文学理论虽会前置于狭义的批评(裁判),即备有预见性的能力,但却不可能独行其道,成为一种无有功用依附的抽象言说,而是还会降落在具体批评或文学活动的层面上。这也就自然导致了他会依据于学界惯力的推移,将自己的著作仍定位在“文学批评史”的概念上。罗根泽的事例表明,尽管他已始注意到了理论在批评与批评史上的分量,但认为通过提出广义的批评的概念,却还是可以在批评史的界面上来容受理论、安排理论的,无须以此淘空批评的内涵,或以理论史来涵盖之,而使批评成为一种不在场的剩义。

限于篇幅,以上的简短回顾与分析似并未将相关的所有问题都揭示出来,但借此至少已能看出,“批评”或“批评史”概念在最初的提出与使用都有其特定的来源与所指,选择这一术语作为学科的称谓也并非随心所欲、可任意改换。在批评史的初期构架中,理论这位迟到的概念访客虽然也受到了接纳,但并不等于就能够与批评(批评史)的概念齐眉举案,同享尊容。

^① 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页7。

二、文论史的出场与范式转型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学科的名称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理论化色彩较强的术语，如“古代文论”、“古代文艺理论”，来命名自己的学科，概说研究的对象。^①当然，情况也非简单，不仅在 50 年代后仍有不少学者以“批评史”来冠名自己的著作，而且直到目前，“批评史”的声音也并没有全然遁入历史景观的背后。然而从总的趋势来看，理论化的称名逐渐占据了学科的主要位置，甚至于在许多撰述中，过去曾经甚为流行的那个批评史概念已为文论史的概念及其属义所取代与整合。从某种角度看，也可以说出现了一个由以“狭义的批评”为主而向“广义的批评”中一更为抽象的展面（即理论）运行的态势。

当然，这一过程也是缓慢地进行的。如作细一些的判析，那么可以将 50 年代至 70 年代视为是一由批评史向文论史趋进的过渡时期。主要表现为因文论史声音的逐渐上升，造成了批评史与文论史的平行滑进，这既反映在学科称名的选用上，也表现在对二者关系的学术处理上。而 70 年代末、80 年代以后，文论史的提法就开始明显地演变为超强的话语。1979 年作为全国性学科协会的成立，即称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学会”（郭绍虞任会长），同时创刊了《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这些命说对学科导向的折转的确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②而以“古代文论”、“古代文学理论”为名的著作、撰述在下一阶段占据了这一学科大部分的出版空间（在更细的分支学科领域则出现了大量“小说理论”、“戏剧理论”、“诗歌理论”等的著作），多种学科内的讨论几乎都是以文论的概念命义的，多种对本学科研究史的叙述也均是用文论史的概念来统合的。至此，“批评史”

① “古代文论”或“文论”这一概念相对比较含糊，可作数种理解：一是指针对文章（相对于诗）的批评与评论，属于体裁学的范畴，郭绍虞等在以前都曾如此用过。二是也可指“古代文学评论”。“评论”一语，罗根泽虽有专辩，但像陈钟凡等也都使用过，如综合诸人所用，其义界实较为模糊，似既指称狭义的批评，也可指称理论性较强的撰述，或将二义均包含其中。三是文论即“文艺理论”的简略语，在此种意义上的用法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最为普遍，可从各种延伸性叙述中辨明。但不一定限于文学原理，也会包含批评理论。本文主要是在第三种意义上来认定的。

② 此学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原来的古代文学、古代文学批评界。20 世纪 90 年代创立的另一全国性学会则主要吸纳来自文艺理论界的学者，冠名为“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

的话语尽管还有坚持的余地,但却已被挤压到了学科的边缘。

由批评而向文论的过渡,原因多多。其中与20世纪50年代后的学科建制变化、在中文领域“理论”或文艺理论的地位被提到指导性的高度等不无关系,与之同时,像“现实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词汇也都以系统性理论话语的方式被确认,并充溢于当时的学科讨论中。当然,在另一方面,这种过渡又与学科内部逻辑的延伸与转换有根深的关联,故应给予充分的关注。由此,自然仍会涉及到早期批评史研究中业已萌生的一些问题,正是这些端倪在思考与讨论中的扩展,引起了学科模式的一步步移位。

再次回到早期批评史研究中,我们似已发现,尽管“批评史”的概念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但对“批评”概念中所包含的理论质素的辨析,及如何在批评这一大的框架下安排理论的位置,则各家的意见仍不一致。大约而言,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偏重于理论的倾向始有加强之势。上述我们已经介绍了罗根泽的情况(其“绪言”见于1944年出版的批评史),又如傅庚生,他于1947年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在自序中对此前的批评史撰述模式始泄其不满,并称此种撰述“……研敷评论学之往迹,群智竟明夫一端;形成文学史之附庸,无缘蔚萃乎大国”。即以为过于限于对文学史的依附,而“不能予人以明确之概念与因依之准则”。^①因此而冀望借助西方理论之烛,而探求中国批评史所呈现的一般性原理,从而表现出了一种比较强烈的理论性冲动。当然,如果从学理变化的角度看,最能代表这种转折意识的当是郭绍虞的经历。

郭绍虞于20世纪30年代结撰其一生成就最大的批评史宏构时,虽然也偶用过“文学理论”这样的词语(见“自序”),却未有任何特定或强调的意思,即便评述像《诗品》、《文心雕龙》这样一些理论化或系统化程度较高的著述,也将其视为是“文学的批评”、“批评的批评”,未以理论明确定名之。^②检其《照隅

① 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自序,页3。

② 如曰:“此二书之所以重要,即因足以代表当时批评家之二派。当时人所需要于批评者,不外二种作用:一、是文学作品的指导者;又一、是文学批评的指导者。文学作品品目多,则需要批评以指导,才可使览无遗功。文学批评日淆,则也需要更健全的批评以主持,才可使准的有依。所以前者是文学的批评,后者是为文学批评的批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页75~76。)

室古典文学论集》，凡涉及学科用语时，早期所撰的一些论文也都是以“批评史”题名的，如《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1927）、《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1930）、《朱子之文学批评》（1938）、《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1948）等，保持了他在通史中十分频繁地使用“批评”这一术语的习惯。然而至50年代以后，他对学科名称的使用却发生了变化，开始在“批评”词语旁增缀了“理论”二字，如其1957年所发表的文章《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道”的问题》（最初的例证）、及后来在1980年发表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研究的问题》等，使用的便是这种双词联缀法。与之同时，郭绍虞于1959年出版了根据其旧著改编的本子也定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1958年始由郭绍虞、罗根泽共同主持编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也命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此后，这一双词并用的做法还见之于其他学者所撰的通史类著作，如敏泽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1）、张少康先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1995）等，想必都会与郭绍虞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毫无疑问，这种变化不会是随意的，尤其当它是以有规律的方式呈现时。从某种角度（历史纵向）看，它与罗根泽、傅庚生等在批评史概念中强化理论的意识会有关联，随着这种趋势的延伸，必然也会在研究中面临来自于“理论”的压力。而郭先生首先选择的是一种折中的姿态，通过双词联缀的方式，其目的也在协调理论在强行生长过程中给批评带来的巨大冲击。^①这一意图应当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当然，如果我们对双词连用命名法作更细的分析，则会发现一些使用时的差异，如一是称为“批评理论”，再一称为“理论批评”，两种联缀方式所指示的意义并不一样。1979年郭绍虞发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问题》一文，对“批评理论”的概念作过一点阐释。据其所述，也就是根据一般程序，首先是在

① 罗宗强在为张毅所著《宋代文学思想史》序言中也曾解释了这一双词联缀方式的含义：“……从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之此种历史状况而言，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并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而言之，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出在这一学科的定名上。名之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它应该只研究文学批评的历史；而中国的文学批评既与文学理论纠结在一起，那么它自然而然应该按照它的历史实际给予命名，名之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这样的命名，在理论研究上可能会较少疏漏，而使这一学科在理论上更趋于严密与成熟。”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罗序，页3。

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产生文学批评,然而由于批评“很容易凭各人主观的爱好,妄加论断,因而批评变得没有准的,这就更需要批评的理论作为根据”。^①因此,批评理论是针对批评而言的理论观照方式,等同于以前他所说的“批评的批评”,然而所用的词语却发生了变动,意在增强理论的含义。而“理论批评”这样的用语就显得有些模糊,容易产生歧义。以我之陋见,似乎各家都没有对这个词语的准确意思作过解释,因此,从表面上看,或是意指理论性的批评,或是指“理论”与“批评”两种方式的同时存在。在1957年撰写的《试论〈文心雕龙〉》一文中,郭绍虞解析《文心雕龙》这部著作的构成,似涉及到对这两个概念的处理,如其谓:“《文心雕龙》分上下二编,上编论文体,以文学批评为主,兼及文学流变;下编论创作,以文学理论为主,兼及语法修辞。……他批评魏、晋以后的论文著作,……都不能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合为一体,不能看到文学的全貌。《文心雕龙》把它分篇叙述,本末具备,细大不遗,另一方面更能根据理论作批评,利用批评证理论。”^②此段表达很明显是将批评与理论看做两个平行的概念,也可将其视为为“理论批评”这一提法所下的一个注脚。这样的持论多少会受及罗根泽的一些影响,并隐含着对自己过去思想的一些修正。而将“理论”置于“批评”之前,则明显提高了理论的位置及突出了理论对批评的指导作用,与“批评理论”这样的联缀法所含有的意义是有看似微妙,实也不可抹杀之差别的。当然在50~80年代这一时期中,像“文学理论”、“古代文论”这几个词语被单独言说的,也能在郭氏的著作中觅得,这也说明他的思想行进步履有时并不是很整齐的。

从郭绍虞对学科称谓措用的改变中,可以看到一种过渡性的逻辑,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过渡已经基本完成。80年代伊始,多数的学科著述已经有意识地以“古代文论”、“古代文学理论”冠名其著,同时也将“批评史”的话语整合、纳入到这一统合性的名称中。后一方面的例证很多,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论资料编选组于198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所编选的对象虽为民国期间诸家的论文,这些论文在涉及学科称名时所使用的也

① 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页413。

② 同上,页14。